



從被研究者到研究者 兼記我語言學及人類學的師友們

被研究者から研究者へ 言語学・人類学の先生と友人たちへのメッセージ併記

From Being a Researched to Being a Researcher:
Something about Me and Also in Memory of the Teachers
and Friends in Linguistics and Anthropology of Mine

paelabang danapan 孫大川 (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)

大學時代之前，我們這一代人所有的學習歷程和環境中，幾乎完全沒有和原住民相關的內容；除了寒暑假在自己的部落參與勞動，多少還能接觸到族老零星談論的文化記憶外，所謂「山地人」，或更精確地說，是一個已經可以不存在的民族。大家似乎都等待著她如預料中的情況一樣，一步一步消逝在時間的洪流中……。

大學時期， 我與語言學家的因緣

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的民族有被研究的價值，是我大二升大三那年暑假。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丁邦新先生，請我協助安排他到台東卑南族地區進行卑南語調查工作。得到家人的許可，丁先生

就住在我家。將近1個月的時間，我和小姊姊就陪同他拜訪卑南8個部落的耆老，權充翻譯和嚮導。有一件事母親直到現在還念念不忘，她曾親眼目睹丁先生在某個傍晚坐在榻榻米床邊縫補襪子的情景；她既讚揚他的勤儉，更提到那一代飽受戰火摧殘、少小離家的外省子弟的悲涼。1978年丁先生出版《古卑南語的擬測》，就是奠基在那個暑假搜集的語料所研究歸結出來的成果。去年（2008）中，在何大安學長邀約的一次餐會上，我和闊別35年的丁先生見面，他長年在美國任教，且已貴為中央研究院院士。他問起我的母親，我告訴他母親已經95歲了，除談到母親身體健康外，還提及母親常提到他縫補襪子的往事……。

孫大川



和丁先生的這段因緣，不但使我學會了記音的方法，也養成了隨手採集語料的習慣。我想我離家40年，卻仍能保有流利的母語能力，應該是丁先生「無心插柳」的結果。大四那年在李壬癸先生的課堂上，擔任卑南語的發音人，不但認識了李先生，更認識了何大安、楊秀芳兩位學長，並展開了30多年疏淡卻雋永的友誼。

語言研究不只是「被研究」，也是一種方法

從語言學的角度來看，做為古南島語原鄉的台灣原住民各族語言，當然有其國際性的學術價值存在。大三、大四那年，我迷上語言哲學，輾轉於邏輯實證論、維根斯坦和卡西勒的思維命題中。當兵回來，考進輔大哲學研究所，碩士論文即以《言意之辯—魏晉玄學對語言的反省及其影響》為題目。可見，語言的研究就我當時的體會來看，不只是「被研究」的問題，它也可以是一種方法，引導我們深入理解人類普遍的文化和心智構造。

原住民的議題，愈來愈需要原住民提供內部觀點

之後，我負笈比利時，原住民社會也在1980年代中期前後產生深刻的變化。當

原住民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，很快地脫離了人類學的範圍，各種領域都開始有原住民角度的切入。原住民不再只是田野研究的對象，也不再是單向的被研究者。

時做為長期研究原住民的「人類學家」，不但是政府原住民政策興革的重要諮詢對象，也是主體意識初醒的原住民青年賴以啟蒙的導師。人類學家李亦園不但完成了有關原住民政策的評估報告，主張以「融合」取代「同化」；同時也規畫設立原住民文化園區。人類學門的版圖擴大了，除中央研究院民族所、台大人類學系（所）外，陸續有清大社人所、東華族群關係所、慈濟人類所、台東大學南島文化所、暨南大學人類所等的設立。1988年秋我返抵國門，戰後出生的第二代年輕人類學者也一一學成歸國，有不少人樂於和充滿主體焦慮的原住民知識青年站在一起，陳其南、許木柱、胡台麗、謝世忠、蔣斌、黃美英、潘英海、劉益昌、王嵩山等人，因而都成了我們一

起奮鬥的伙伴。原住民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，很快地脫離了人類學的範圍，政治、社會、歷史、經濟、教育、藝術、土地、環境、地理、文學、樂舞、傳媒等等領域，都開始有原住民角度的切入。原住民不再只是田野研究的對象，也不再是單向的被研究者；這些複雜多頭議題的解決，愈來愈需要原住民提供內部觀點並參與其中。

不但是態度改變的問題，更是學術實踐的問題

這樣嶄新的學術對待情勢，我們不妨就稱它是一種正在發展中的「新伙伴關係」。

這種關係，鼓勵我們揚棄頑固的人類學家將原住民編進自己理論框架的誘惑；同時正視並積極挖掘原住民主體的能動性。成敗的關鍵還是在「人才」培育。怎樣讓更多的原住民從「被研究者」成為「研究者」？不但是態度改變的問題，更是學術實踐的問題。近年來政大民族學系在原住民人才培育、原住民事務參與方面的表現與成果，很值得版圖一直擴大到客家學院的人類學界認真參考。◆